

來自台灣的本港作家廖書蘭博士。



廖書蘭：寫作香港，日久他鄉即故鄉



《放飛月亮》盡顯廖書蘭對文學的詩意情懷。



《煙雨十八伴》，講述廖書蘭心中的台灣兩地情。

身為台灣人的香港作家——這是本港作家廖書蘭對自己文學身份的定位。擔任藝術發展局文學組審批員已歷15載，廖書蘭的文學舞步一直未停。台灣是廖書蘭的故鄉，亦是其成長的所在，而香港則是她人生重要歲月的旅居之處，更是寫作高產的地理場域。日久他鄉即故鄉。寫作人生數十載，香江歲月不了情。廖書蘭的文學暢想，也隨着年輪的層遞而注入了更多深刻的文化、社會與未來思索。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受訪者提供

從台灣到香港，這一條路是人生之路、愛情之路，也是文學之路。若將生活、寫作合一於社會的視角中，廖書蘭演繹的是一個文化與自我的二重探戈舞曲。她在寫作與文化思索的時光中，扎根在了香港的本土生活裡，從而用手中筆寫下了城市的繁語、地域的靈動以及最鄉土的在地原風景。

欣賞隨性而發的詩歌創作

曾獲亞洲華文作家文藝獎的廖書蘭，現擔任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的會長。寫作毫無疑問是她人生旋律中的重要樂章。《放飛月亮》是她非常成功的一本詩集，充滿女孩式的夢幻與純真。在記者對廖書蘭進行專訪時，探討的話題不僅僅是她的作品，在某個角度而言，更重要的，或許是廖書蘭形成作品的動力、淵源和基礎。

廖書蘭對記者表示，寫作是自己自小開始接觸的一種心靈語言敘述方式，也是與生俱來的一種能力。當然，寫作的質量、層次、水準，乃是隨着人的成長而不斷上升。但寫作作為一種興趣或愛好，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往昔的生活經歷和情感。

詩歌是廖書蘭寫作的一個重點。她的詩句，包括廣受文壇好評的《放飛月亮》，乃是新體漢語詩歌，其詩歌的文字韻律和強烈的節奏感能夠令人對漢語文學產生一種儀式感的莊嚴崇拜。「寫詩——尤其是寫作的過程，乃是一種情緒的宣洩和需要。在我看來，寫詩之所以作為一種文學創作形式經久不衰，乃是生命的需要，畢竟，每一個人——包括寫作者在內，大家的情緒需要一種出路，正是這種出路奠定了詩歌美感的內在心靈基礎。」廖書蘭進一步解釋道，寫詩乃是在探索和撫慰內心的世界，在詩歌的創作進程中，詩人自己是否愛一個人、以何種方式愛，也許連她（他）自己都不知道。當創作完成時，自己心中這份朦朧的情感也就變得具體而清晰。

相較而言，散文的形式特質，則在廖書蘭的眼中，顯得理性很多。「散文寫作，乃是春花秋月的年輪」，這是廖書蘭的評價。對散文創作亦涉入極深的廖書蘭認為，聽、看、想，書寫生命，將感受加以記錄，便是散文一種的底色品味。她特別告訴記者，若以粵語創作散文為例，在香港的環境中，便能夠產生一種神似感。這種神似感是什麼？是香港生活的複製與投射？抑或個人經歷的回憶？廖書蘭認為，每個人品讀這類在地化的散文，或許都有不同的感知。

文學經典乃研習寫作之工具書

廖書蘭近年來的創作多和香港有關，尤其是與新界原居民的生活與文化有緊密關聯。身為台灣人的香港作家，廖書蘭怎樣看自己的故鄉，是記者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

「台灣是我成長的地方，對台灣，我一直都有着濃厚的鄉情。」這是廖書蘭心目中的台灣。她所感受的鄉情，不僅僅是對兒時與成長生活的回憶，也是一種文學心靈上的追根溯源式的梳理和認知。她告訴記者，主要以中文進行寫作的自己，其漢語言的習得與培養，很大程度上來自過往在台灣接受的中文教育，這種教育不僅僅帶來了對漢語文字的識別和運用，更將漢語文字作為一種審美的生活形象植入自己的心中。故而，自己的中文功底與台灣密不可分。即便是後來來到了香港，初時不懂廣東話的廖書蘭，也是以閱讀台灣報紙作為接受資訊的重要方式。文學式的鄉情、鄉情一般的文學，使得廖

書蘭對漢語文學經典的功用有了深刻的認識。「我自小喜歡看《紅樓夢》和《水滸傳》，並且主動進行筆記，因而促進了我寫作生涯的成長，所以我一直認為，對待中國傳統的文學經典，應不僅僅視之為膜拜的雅作，更應當看成是可以為自己寫作打基礎的工具書。」廖書蘭的此種意識，所延伸出的不僅僅是對漢語文學的態度，更是對漢語文化史的一種深度價值觀。

扎根香港的不變之情

《放飛月亮》是靈動的，而廖書蘭的散文集《煙雨十八伴》則具有濃厚的香江風情。例如，在《地圖人》一文中，她深入描繪了本港地圖收藏者的心路感知與情感。香港成為了「日久他鄉即故鄉」的安身立命之所在。「無論香港經歷怎樣的變化，我都會堅持留在香港。」這是廖書蘭的香港抉擇。「我的父輩經歷過戰亂時期的遷台經歷，那是一種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漂移、漂泊的生活，而台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帶有很強烈的思念大陸家鄉的情感色彩，所以我的人生也一直有一種漂的感覺。在台灣人的眼中，我是大陸人；而在大陸祖輩看來，我已是地道的台灣人；但在香港人看來，我又是新界原居民的兒媳。」廖書蘭對往事的回憶顯得很穎麗，因為在她看來，自己隨夫來港，成為香港的一分子，生活也慢慢變得越來越有扎根在地的認同。

日久他鄉即故鄉。廖書蘭向記者講述起SARS疫情肆虐時的往事。她的丈夫在醫療機構工作，疫情嚴重時，醫生們面臨着極大的感染風險，而後來發生的一些事實也確實證明了這種風險的存在和危急程度。因此，為了避免造成可能對家人構成的生命健康影響，在那一個時期，香港的不少醫生選擇住在酒店。但廖書蘭為了自己的丈夫能夠以飽滿的鬥志全身心投入工作，能夠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在做足防護措施的情況下，她讓丈夫每日如常回家，不離不棄，並給予全心全意的照顧，那一刻，她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地道的香港人，是家庭和這座城市的一分子。

這便是廖書蘭扎根香港的不變之情。這種情感業已反映在了她的文字之中。許多作品都能夠感受到這種濃濃的香港彼岸的新鄉情。她說，寫作會繼續，如同自己在香港的生活會繼續一樣，講述一個台灣女孩的香港生活故事。



廖書蘭表示，自己的寫作人生，具有無窮的憧憬、信心和熱愛。

情繫原居民的點點滴滴

如今，廖書蘭的寫作甚至文化歷史研究，多以新界、尤其是原居民的歷史生活變遷為主軸，並以文學的視角去詮釋和注解原居民在香港歷史中的意義和作用。

「原居民淳樸、老實，這些是中國農民傳統固有的善良品質，而且他們為香港這座城市的發展作出了相當大的犧牲和貢獻。」面對記者對原居民與香港歷史聯結關係的提問，廖書蘭給出了這樣的答案。

每逢年度的春秋二祭，香港人多返回廣東祭祖。但原居民的祖墓則就在香港。她以萬宜水庫為例，指出：水庫之下，便是過往原居民的村莊、祖屋甚至祠堂，正是因為這些在原居民心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土地被貢獻出來，香港自上世紀的七十年代開始，才告別了水荒歲月。而到了後來甚至

今日，本港新市鎮的開發與擴大、土地供應的增加，其實都伴隨着原居民對香港的付出。廖書蘭認為，這些都是不能夠被忽略的香港發展史中的重要環節。

不僅關注原居民與城市發展史的關係，原居民歷史中的生活與文化，也是香港社會與旅遊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位於沙頭角的村落村屋，記錄着當年孫中山反清革命的光輝歷史。至今都能够在這些房屋中找到相應的歷史痕跡；從明代開始以來形成的建築，更是留下了原居民根植新界的歷史足跡；太平清醮更是從東漢流傳而來的風俗，這些都是香港社會重要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資源，」廖書蘭向記者說道。情繫原居民的點點滴滴，也成為了她自己的一項文學和文化的使命。

寄語新一代努力學中文

華人寫作離不開中文，也離不開社會的文化環境。身為藝術發展局文學組的審批員，廖書蘭高度肯定香港目前所執行的文學藝術發展資助體系。她以「德政」一詞來形容官方、藝發局以及整個香港社會對文學的扶持。之所以對現行的文學資助方式和體制抱持高度肯定的態度，廖書蘭表示，其原因在於：目前以藝術發展局資助的形式去幫助作家，並以專業人士進行審核，使得在支持一個作家時，避免了潮流化、商業化帶來的影響，從而令到作家可以心無旁騖地專心創作和思索，貢獻更多優秀的作品。

中文寫作必定是以純熟的中文運用為基礎。廖書蘭說，就她本人的觀點而言，中文的文學之作自古以來便有雅俗之分，

完全可以並存。而在香港目前兩文三語的語言架構之下，青年人應該以更加宏大的視野去看待和學習中文。

「我在英國時看到的新加坡青年人，他們首先會用英文和你溝通；當知道你會說中文時，他們便能夠輕鬆轉以中文進行交流；而他們更進一步知道你來自台灣時，新加坡青年人也會使用閩南話。」基於這樣的經歷，廖書蘭向記者表示，如若不能夠純熟掌握中文，香港的未來一代人將很難融入到中華社會中，競爭力的提昇也會受到阻滯，因此她期待新一代人能夠以更加積極的態度熟練運用兩文三語。

